

高 风 亮 节

——乔国桢烈士事迹散记

〔附记〕一九八〇年九月，在江西南昌人民医院我两次访问了正在离休疗养的江西省检察长刘护平同志。他深情地回忆了一九四五年在盛世才监狱养病室护理乔国桢同志的一段往事。根据口述及其他资料，整理出这个事迹片断。

刘镇海记录並整理

一九四五年七月，乔国桢同志牺牲于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狱中。

乔国桢同志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和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其他同志一起，被盛世才诬以“四、一二阴谋暴动”的罪名逮捕投入监狱的。国桢同志因积劳成疾在苏联治疗了两年刚刚恢复健康，又一次受到了酷刑摧残，他的肺病复发了。由于不停的咳嗽和咯血，严重地威胁着国桢同志的生命，经过狱中同志们的斗争，盛世才不得不把他送到监狱里所谓“养病室”看管起来。养病室座落在中桥附近，名为养病室，其实和其他牢房一样，根本没有什么治疗，只不过是把病人隔离起来，囚徒是死是活，让其听天由命罢了。

患肺病特别需要较好的营养，可是两年多来，监狱里每天都是两个渗砂子又散发着霉味的馍馍或高粱糠，一块咸菜或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水汤，把国桢同志的身体摧残得不成样子了。瘦骨嶙嶙的高个头越发显得高了，头发胡子很长，脸盘干瘪，显出两只似乎特别大的眼睛。他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尿尿、血痰到处都是，苍蝇成群，空气污浊。彭健同志（即刘护平）同志初到养病室看到战友的这种处境，伤心的流泪了。

乔国桢同志在狱中，虽然健康状况不好，还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扶病向年轻同志讲述他在狱中生活经验，劝导他们利用时间学习，要求团结一致向敌人作斗争。被送到养病室单独囚禁后，仍然不忘为党工作，他把自己历次入狱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写成材料，秘密转交狱中党组织，要大家坚定信念，坚守立场，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无罪释放回延安的胜利。他的囚室一度也成了秘密联络站。“机要交通员”是好心肠的维族“工犯”尼亚孜担任的，他利用给犯人理发的便利，出入于各监狱。后来，乔国桢同志和狱中的联系越来越少了。恰好，李宗林同志因受刑而精神错乱也被送到养病室来了。党组织从和李宗林的联系中，得知乔国桢同志日益恶化的病情，就决定派彭健去护理乔国桢，办法是装成重病号，瞒过狱方，让狱方把彭健送去住养病室。

彭健同志为了得“重病”，自动绝食三天，果然面黄饥瘦，“弱不经风”，在“放风”时，突然晕倒在院中，其他战友马上大声嚷嚷，有的呼喊：“彭健！彭健！”有的喊：“监狱长！快送医院，救人！”这一招很灵，狱方上当了，彭健去养病室的计划实

现了。

彭健的到来，乔国桢同志高兴的流出了热泪，他是多么需要有一个战友在他身边啊！但他马上严肃地说：“老彭，谢谢你的关怀。你知道我的病是会传染的，过去我的左肺已经烂空了，这次复发又发展到这么严重，你呆在这儿是会传染给你的。你还年轻，还可以为党做许多工作，不要因为我而损害了你的健康，这是对革命的损失啊！你应该向狱方提出调一个号子。”彭健同志深深的为老乔关心革命大局、关怀同志的无私精神所感动。他强忍住了眼泪告诉乔国桢同志，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全体同志的心愿。乔国桢同志才不得不勉强让彭健同志留下来。

彭健同志给国桢收拾好卫生，又拿出狱中同志们特意为国桢同志拍卖衣物得来的钱，买牛奶、鸡蛋、羊肉等富有营养的食品给病人滋补身体。这样伺候了几个月，乔国桢同志病情有了好转，身体也稍有恢复。

在这段护理期间，要动员国桢同志吃东西，是彭健最为难的事。因为乔国桢同志总是考虑残废同志以及和妈妈一起坐牢的孩子们的健康，念叨狱中同志们。他说：“给我特殊好吃的，我心中是难受的，我难以下咽，许多同志需要照顾啊！”

在彭健同志的细心照料下，国桢同志的身体状况稍有一点好转后，他就坚决拒绝吃为他特意买来的食物，要求彭健同志把同志们的心意转用到最需要照顾的同志身上去。

由于长期的折磨，国桢同志的病情终于恶化了，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关心全国革命形势，关心狱中战友，因自己不能再为党工作而感到内疚。他对彭健同志说：“对死我不惧怕，我心中难过的是，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过去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够，你出狱后，把我的情况报告给党组织。”

乔国桢同志牺牲时年仅四十岁。

同志们在狱中开了追悼会，并把花圈送到他的墓前。

乔国桢同志是陕西葭县乔家寨人。一九二四年曾就学于绥德师范，是个品学兼优、身体健壮的学生，在学校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绥德地委派去广州学习，在广东农民讲习所里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课，对中国革命要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思想，感受很深。他毕业回陕西后，致力于农运，任中共陕甘区委员会农运书记，在西安附近的三原、富平、渭南、华阴一带展开活动。他经常深入农村，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条件成熟时就组织农民协会与打着“保卫桑梓”旗号的反动民团作斗争，与地主豪绅、反动政府作斗争，取得了不少胜利。如，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处决了一些恶霸等等。由于他为农民办了许多好事，因此深受农民爱戴，农民们套用三国演义中“若要好，遇乔老”的故事，昵称他为“乔国老”。一次他不幸在三原武宁区被驻军逮捕，四乡农民闻讯，一天之内有数千农民络绎不绝进城包围驻军司令部，出具了八百张保状，要求保释乔国桢同志。驻军慑于农民的威力，怕激起民变，就将他释放了。

一九二七年春，在北伐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陕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党决定召开陕西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农民陕西省协会。为了庆祝大会的胜利召开，数万农民在乔国桢同志的率领下，肩扛锄头在大街游行，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等口号，给古城西安以很大的震动。冯玉祥先生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驻扎西安，他说：人们说我的兵多，我的兵与乔先生领导的农民队伍相比，实在是少的多啊！倘若乔先生的农民全部集合起来，我的兵连其万分之一也不到，真是望尘莫及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而失败了，革命人民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乔国桢和刘志丹、唐澍一起，遵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击国民党的总方针，在一九二八年初，发动了著名的“渭华暴动”。暴动是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西北高原上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一声春雷，但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不幸失败了，乔国桢同志被捕入狱，经过党和人民的多方营救，又被释放出狱。

考虑到乔国桢同志的处境，党组织决定把他调离陕西，去北方局工作，任北方局职工委员会书记，活动于北平，天津和冀鲁豫广大地区。他曾深入英国人操办的开滦煤矿和矿工一起挖煤，组织工人向帝国主义作斗争。在北平组织三万多洋车夫向电车公司洋老板作斗争。在每一斗争中，国桢同志总是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为敌人所痛恨，所以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离开北平之前，曾多次被捕。在唐山被捕时，敌人要枪毙他，他机智地越狱逃跑，但摔坏了腿。在天津被捕时，和彭真同志一起，成功的领导了狱中绝食斗争，迫使狱方接受了绝食者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改善狱中的生活条件。其后，由组织营救出狱，担任华北赤色互济会党团书记。

国桢同志长期不辞劳苦，为革命事业奔波在工厂、矿山和农村。一个时期住在天津刘庄，每天都瘸着腿拄着拐杖去河东区工作，往返三十多里，有时吃个窝窝头，有一天也吃不上饭，他还是照样开会，工作，身体受到了损伤。两次入狱，倍受折磨。出狱时，竟染上了肺病，使健壮如“黑塔”的国桢同志变得骨瘦如柴、面目黎黑，难以辨认了。

国桢同志出狱后，虽然卧病在床，但革命意志没有丝毫动摇，精力也非常旺盛，仍然日以继夜的学习革命理论，写日记，研究问题，帮助失掉联系的同志接转组织关系。同志们说：“只要找到老乔，就能找到党组织。”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向我国进攻，国民党步步退让，北京一些大学生报国无门，犹豫彷徨。乔国桢同志了解情况后，找他们谈心，分析时局，帮助他们去山西和陕北，鼓励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乔国桢同志在天津搞工人运动时，再一次被敌人追捕，偶然得到了周铁忠的帮助和解救，相互认识了。国桢多次向铁忠宣传革命道理，引道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铁忠同志是湖南人，比国桢同志大两岁，在天津一纱厂作女工，后来由于他们的志向一致，相爱结婚了，建立了一个革命的、和睦的小家庭。结婚刚刚十七天，这个家庭又被拆散，周铁忠被捕了，相互音信全无。七年后，周铁忠收到一封信。信中写到：“南北千里，一条长锁紧相连，我们要用这条锁链绞死我们的敌人，再团圆。”署名“黑塔于病床。”铁忠同志非常激动，尽快地来到北平骆驼庄去看他。辗转于病榻之上的国桢同志的形象，使铁忠心酸地流下泪来，国桢同志不是用温情脉脉的话去劝阻，却诙谐地说：“革命的人还流泪？不怕羞！”乐观的气息感染得铁忠破涕为笑。他们相互交谈了别后的情况，当铁忠说起没见过爸爸面的小女儿乔莎，留在湖南老家时，国桢同志皱起眉头，转过脸去，显然以见不到孩子为憾事。他在深深地怀念亲人啊！后来，国桢同志说：“大姐，

你该回去了，回城里去住。”

“那怎么行？你病的这样厉害，让我来服侍你。”

“我写信让你来，是让你接转关系的，又不是让你呆在我身边得肺病的。你想想你是革命的人啊！”

革命的利益、同志的健康，压倒了对久别妻子的思念，国桢说服妻子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投身于滚滚革命洪流中去。后来由于国桢同志病情恶化，党组织决定，铁忠才回到丈夫的身边，担负起照顾的责任，一起西行到陕西上终南山休养，但时间不长又很快分别了。而且成了这对革命夫妻的最后诀别。

因为党组织为了使国桢同志尽快地恢复健康，一九三八年决定他去延安休养，同年又送他去苏联治疗。一九四一年九月他和杨之华同志一起从苏联回国，留在新疆工作，一九四五年牺牲在新疆狱中。

* ~ ~ ~ ~ *

{ 小 资 料 }

* ~ ~ ~ ~ *

我党诞辰纪念日的由来

七月一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演《论持久战》时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同志，他们记得“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现经考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原编者注）又无档案资料可查，于是就把七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

“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见诸中央正式文件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一日。这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周年纪念指示》，文件中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第一个指示。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的。

（摘自辽宁《共产党员》）